



现代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ity

大学

【美】茱丽·A·罗宾/著

的形成

Julie A. Reuben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M



的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尚九玉/译校

贵州教育出版社

Julie A. Reuben



现代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大学

【美】茱丽·A·罗宾/著

的形成

Julie A. Reuben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M



的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贵州教育出版社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by Julie
A. Reuben

Copyright © 199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中文简体字版 © 2004 贵州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大学的形成:知识变革与道德的边缘化/(美)
罗宾著;尚九玉译.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5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ISBN7-80650-264-5

I. 现… II. ①罗…②尚… III. 高等学校—研究
—美国—现代 IV. G649.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772 号

现代大学的形成

(美)茱丽·A·罗宾 著 尚九玉 译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24.75 印张 385 千字

版次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264-5/G·272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6774152 邮编:550004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祖母

法伊玛·罗宾

中译本序

大学的使命是什么？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完成这种使命、实现这种目标？这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热点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也曾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美国高等教育史学者茱丽·A·罗宾博士的这本《现代大学的形成》，就是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界以及思想文化界对于该问题之探索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或许可以为我们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回答该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

茱丽·A·罗宾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教授。作为教育史学者，罗宾一直对教育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感兴趣，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教育之目的、教育机构与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影响教育变革的力量等问题。罗宾的研究专长是高等教育课程、教育史、道德伦理研究、多种文化的教育等。罗宾的主要著作有《现代大学的形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及一些论文。目前，罗宾正在从事《校园反叛：政治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的写作。

《现代大学的形成》是罗宾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精心修改补充而成的，这是关于美国大学道德教育的第一部主要研究著作。在这本书中，罗宾基于对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斯坦福、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等八所美国著名大学的广泛研究，系统地考察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大学中变化的知识观念、学术标准、宗教与道德之地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罗宾认为，围绕20世纪之交的六十年是美国大学从传统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变的时期，即现代大学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知识观念发生

变化,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传统的道德教育遇到了挑战,以 19 世纪的真理观——真理一致性观念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目标发生了变化。于是,教育家们力图在知识观念变革的条件下,通过重新理解科学与宗教、提倡和坚持自由探究、重建宗教、以科学替代宗教、强调价值中立之科学、发展人文学科、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鼓励校园课外活动等方法,进行大学的道德教育,维护大学的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统一。然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表明,教育家们所发起的大学改革运动和学院改革运动都未能使现代大学像传统学院那样实现这个目标,教育家们的种种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

换言之,在罗宾看来,现代大学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传统道德教育衰落的过程。在现代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分离了,知识教育成了现代大学的主要使命,道德教育则衰落了,知识在现代大学中之地位的日益重要导致了道德在现代大学中之地位的日益不重要,知识日益成为现代大学之中心,而道德则日益成为现代大学之边缘。这正是本书副标题“知识变革与道德的边缘化”的含义所在。

不过,罗宾也指出,大学从来没有宣布正式放弃它们传统的道德目标,教育家们仍然认为大学应当使其学生为“正当地”生活做准备和为社会进步做贡献,这在今天仍然是大学的一个重要准则。

《现代大学的形成》虽然探讨的是美国 20 世纪之交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道德教育的变化问题,但对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德育教育发展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当代中国大学的德育教育发展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如,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大学生人文素质问题,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等等。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研究和总结我国大学道德教育自身的经验和教训,而且需要研究和借鉴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择其善者,为我所用。

其次,当代中国的主要大学都在努力向研究型大学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然会遇到与美国大学类似的问题,特别是道德教育在大学中之地位的变化问题。本书的研究表明,美国大学在其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道德教育的边缘化。中国的教育学家不得不思考和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在现代大学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道德教育的边缘化?如果是,那么在

当代中国主要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过程中如何避免道德教育的边缘化?

第三,本书所描述的美国高等教育家为进行大学道德教育所做的种种努力,如指导教师制度、校园课外活动、人文学科教育等,可以与当代中国大学的道德教育发展相互印证、比较,为我国大学道德教育发展提供某些借鉴经验。

当然,以上只是译者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译者本人并非高等教育史方面的研究者,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史也涉猎不深。译者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从事本书的翻译,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在当代中国主要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过程中,大学的道德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热点问题,并且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译者本人也在大学从事道德教育,而本书探讨的正是美国大学从传统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变过程中道德教育的发展变化问题,这使得译者对本书具有强烈的兴趣。其次,译者在西方哲学史、宗教学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对于大学文化、人文教育等问题始终非常关注,并且也有所涉猎,这使得译者有信心准确地把握本书的文本。当然,对于翻译本书的兴趣和信心并不意味着翻译的质量。鉴于译者的学识和能力所限,错误和不当之处自然难免,敬请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致 谢

在我致力于本书写作的这许多年里,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大量的帮助,我非常高兴(和欣慰)终于能够在出版时表达我的感谢。本书的前半部分本来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因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全体老师。我特别幸运地成为卡尔·N·德格勒的学生,我从他知识的渊博、帮助和鼓励中受益巨大。这项研究起源于一份在乔治·M·弗雷迪克森的指导下撰写的研讨班论文。我与他关于美国文化和知识史的讨论,促成了这项研究。我感谢大卫·D·肯尼迪对本书的兴趣和他对我的工作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还要感谢保罗·罗宾逊对我的论文的建议、蒂默西·勒诺阿对第二章初稿的评论、艾斯特勒·弗雷德曼和豪尔·卡恩的鼓励和建议。

研究生们之间的相互帮助使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历变得十分丰富。贝基·洛文、琳达·普雷扎拜泽、维斯基·戴尔·普兰蒂斯、麦可尔·塞尔曼、菲尔·爱廷顿、佩吉·帕斯科、彭妮·罗塞尔和简·德兰西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支持。道格·克拉斯梅耶阅读了我的论文,并与我就世俗化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交谈。我特别幸运地在我初次行走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时,就认识了布鲁斯·舒尔曼,他帮助我通过了自那时起我所面临的所有挑战。我认为与他的友谊是关于我想成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决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我也从斯坦福大学之外的学者们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帮助。詹姆斯·T·克劳本贝格、多萝西·罗斯、詹姆斯·特纳、大卫·霍林格、乔治·马斯顿和詹姆斯·布切尔阅读了我的论文。我还要对詹姆斯·特纳和另一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论家对原稿所做的有益的评论表示感谢。本书编辑道格·米切尔使这项计划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

哈佛大学档案馆、耶鲁大学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霍普金斯大学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手稿分部、芝加哥大学的特藏部、密歇根大学的本特雷历史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班克洛夫特图书馆和斯

坦福大学档案馆的管理员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巴巴拉·克罗纳和斯坦福大学古巴雷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不厌其烦,把他们收藏的大量关于大学的资料供我使用,斯坦福大学格林图书馆馆际外借部的索尼娅·默斯总是迅速而愉快地尽可能为我借到需要的书籍。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大学麦克德默特图书馆馆际外借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对我第二阶段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我得到了怀廷研究基金和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韦特基金的慷慨资助。斯宾塞基金会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我帮助,首先是提供了学位论文学年奖学金,其次是提供了国内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基金。除了它的经济资助,我还得到了作为计划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与斯宾塞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的快乐。他们对于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奉献精神对我是一种激励。

我也要向《中美洲》的编辑们允许我重印我的文章《错误的期望:宗教之科学研究在现代美国大学(1890~1920)》(《中美洲》第7期,1995年春季和夏季卷)的部分内容表示感谢。

我的朋友们和家人也直接和间接地给予我很多帮助。我要感谢米切尔·鲍德勒和玛丽·高曼、赖瑟·布洛迪、赖彻尔·麦克赖希兰和琼·古德曼、朱迪·卡尔豪恩、爱丽丝·凯林、迪阿·麦克尔斯和托尼·古尔提里、洛韦特全家、巴巴拉·罗宾、塞达·罗宾和尼尔·罗宾。我尤其感到幸运的是,在我写作学位论文时,我的好朋友朱丽亚·法希克是我的邻居。她具有发现有益方法的独特才能。我的父母伊利亚胡·罗宾和波拉·罗宾给了我充满爱和支持的生活。

我把我的最大感激献给丽莎·洛韦特,她为这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且在我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这许多年里给予我支持。

茱丽·A·罗宾

目 录

导言	001
第一章 真理的一致性	017
第二章 科学和宗教的再理解	040
第三章 开放的大学	069
第四章 宗教的重建	103
第五章 宗教的科学替代物	155
第六章 价值中立的科学	205
第七章 从真到美	245
第八章 管理制度	266
结 论	309
索 引	312
译后记	384

导 言

1884年,作为哈佛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准备活动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监事会采用了一种新校徽。新校徽将拉丁文“Veritas”,即真理,放在它的中央。这一新格言与一系列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改革——包括引入选修制、废除强制性礼拜活动、发展科学实验室——紧密相连。发起这些改革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将其教育观点概括为:“普通教育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别无其他……一种执着探究、寻求真理的精神或性格。”因此新校徽认可了当时正在使哈佛大学从一所传统的古典学院转变为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变革。^①

尽管哈佛大学监事会成员通过批准1884年校徽表明了其对改革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打算批判传统。刻有“Veritas”的校徽既与过去相连,也与未来相连。在19世纪三十年代,校长乔西亚·昆西(Josiah Quincy)指出,产生于1643年的哈佛学院的第一枚校徽,就已经使用题写在三本打开的书本上的“Veritas”这一格言。然而,在采用这一格言后不久,最初的校徽就被一种新的校徽所取代,新校徽宣称大学的责任是荣耀基督。第二种校徽及其“In Christi Gloriam”的格言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这时它被使用“Christo et Ecclesiae”铭文,即为了“基督和教会”的第三种校徽所取代。^②

在其任期内,昆西曾试图重新使用以“Veritas”为铭文的校徽,但未成功。反对者们指责说这一行为将削弱哈佛大学的宗教使命。昆西试图通过强调原始校徽的宗教含义来表达这种关注:“校徽上的书本可能是用来代表圣经;格言用来暗示惟有在圣经中重要的真理才能被寻求和发现,而不是在人类创

① 查尔斯·W·埃利奥特:《普通教育原理》,《教育家杂志》,1908年第8期,第499页;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哈佛三百年(1636~1936)》,坎布里奇,1936,第14章。

② 乔西亚·昆西:《哈佛大学史》,2卷本,波士顿,1860[1840],第1卷,第49~50页,第2卷,第646页。

造的话语中。”在 1884 年,监事会想表明,他们实施改革和采用新符号“Veritas”不是要放弃这个学校传统的对于宗教的责任。为了强调这一宗旨,1884 年校徽保留了“Christo et Ecclesiae”的铭文。这一旧格言围绕着铭刻在校徽中央的三本书上的“Veritas”。^①

在 1884 年,哈佛的管理者认为他们新校徽上的两个短语是谐调一致的。它们继承了一种把真理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观。“真理”这个术语包含了所有正确的知识;宗教教义、常识信仰和科学理论都依据同样的认知标准来判断。宗教真理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知识形式,因为它赋予世俗知识以意义。宗教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道德的”真理——它指导个人的日常行为,解释他们的终极命运。尽管当代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和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准确性的争论威胁到这种真理概念的存在,但哈佛的管理者们方通过 1884 年校徽证明,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否定宗教与真理之间的密切关联。

哈佛校方关于真理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的信仰。在 19 世纪晚期,知识分子们认为真理具有宗教的、道德的和认知的三个维度。然而,到 1930 年,知识分子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宽泛的真理概念。相反,他们信奉一种将“事实”与“价值”明确区分的知识观。他们把认识论真理与经验证实的知识联系起来,并且认为根据这个标准,道德真理不能证实为“真”。在 20 世纪的词汇中,只有“科学”才构成真正的知识。道德的和宗教的价值在情感意义上或非文字意义上可能是“真的”,但从认识上能够检验的知识的角度来看则不是“真的”。“真理”这个术语不再理所当然地包括实际知识和道德价值。

本书考察了从 19 世纪宽泛的真理概念到 20 世纪事实与价值之区分的转变。事实与价值之区分的原因是复杂的、由多方面决定的,这使得它们可以从几种角度进行研究。最常见的方法是依靠知识分子的传记。例如,罗伯特·普洛克特(Robert Proctor)在《价值中立的科学?——现代知识中的单纯性和力量》中研究了西方知识分子关于科学的观念的历史,并且将价值中立的科

^① 昆西:《哈佛大学史》,第 1 卷,第 48 页。关于 1884 年校徽,参见哈佛大学:《纪念会档案(1886 年 11 月 5~8 日):哈佛大学建校 250 周年纪念》,坎布里奇,1887,标题页。

学这个概念的充分发展归因于 20 世纪早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①

虽然我并不拒绝所有形式的知识分子传记,但本书采用了一种制度方法来研究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原因。我认为,对于既包括知识又包括道德的宽泛的真理概念的拒绝,与教育实践和学术实践中的变化密切相关。在 19 世纪上半叶,这种宽泛的真理概念——在当时称作“真理的一致性”——在高等教育的结构之中被制度化。学院保持着一套以高年级的道德哲学课为顶点的课程,这种道德哲学课被设计用来统一所有高级的学问。这个课程完全是规范性的:它教导学生对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国家和上帝的责任。道德哲学和自然神学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调和宗教教义与世俗研究结果的讲坛。这些教育的和学术的实践使得真理一致性的抽象观念成为具体的存在,从而增强了它的合法性。

然而,在 19 世纪晚期,有助于维持这种宽泛的真理概念的教育和学术实践受到攻击。很多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认为,这种标准化的课程将重要的现代学科和实践学科的教育排除在外。他们同时也指出,学院的课程排斥了几乎所有学科的深入教育。他们担心这种受限制的课程正在阻碍国家的知识进步和物质进步。关于进化论的争论也削弱了对自然神学这种调和宗教和科学的最主要方法的支持。自然神学在提出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的同时,似乎也限制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为了增进知识,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更好的关系奠定基础,一群学者和教育家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实践进行了重新建构。

19 世纪晚期的大学改革家们并不拒绝真理一致性的理念,他们并没有打算从高等教育中废除道德或宗教,也不赞同一种强调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模式。相反,他们希望建立新的既能够体现他们的真理综合各种知识并与道德关联的信念,也能够为学术发展提供基础的制度形式。这些目标被证明是相互矛盾的。数十年里,改革者们在曲折中为建立新的、能够在致力于知识进步的同时又服务于古典学院之道德目标的大学而奋斗。在他们的努力下形成的教育与学术的实践,鼓励了专业化而非知识的综合。新的、与知识发展

① 罗伯特·N·普洛克特:《价值中立的科学?——现代知识中的单纯性和力量》,坎布里奇,1991。

相一致的知识概念使得教授们不再从事研究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到 20 世纪早期,真理一致性的理念对于那些在新型大学中接受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似乎已不再可信。20 世纪的大学教师接受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因为它符合过去五十年来学术与教育实践的发展。知识与道德的分离是 19 世纪晚期大学改革的一个没有预想到的结果。

大学的领导者们试图建立几种不同的现代道德教育模式。我把他们的努力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讨论:宗教的阶段,大致发生在 1880 至 1910 年间;科学的阶段,大致从 1900 到 1920 年;人文主义的和课外的阶段,大致在 1915 至 1930 年间。当然,把它们分为连续的阶段的观点有些简单化。实际上,这些不同的努力是相互交替和相互竞争的。尽管如此,阶段性的观点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特定的道德教育模式的提倡者们主导着高等教育内部相继出现的论调,这些论调是已认识到的、原来最有希望的道德教育模式失败的结果。

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在新型大学中建立现代道德教育模式的尝试,与基督教的重建联系在一起。19 世纪晚期的大学改革者们,像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道德不可避免地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然而,大学的改革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大学改革者们反对过去的教派控制形式,认为它们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对立的。他们认为教派统治造成了稀缺的教育资源的分散。同时,他们也认为教会的主办者地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因为教派学院更喜欢从他们自己的教派中聘用教授,所以他们未必把大学的职位给予那些最优秀的学者。最后,改革者们认为教会控制阻碍知识进步,因为教会领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与教会教条相违背的思想。

最后一条指责是最严厉的。它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即宗教依其本性与知识的发展是对立的,并因此与致力于知识进步的教育机构是冲突的。这种可能性是 19 世纪晚期宗教与科学之间冲突的核心。然而,著名的大学改革家们,如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埃利奥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和密歇根大学的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 Angell),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改变宗教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使其与现代的、科学的知识探究标准相一致。

在关于进化论和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广泛争论中,美国的科学家和神学家们试图界定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确定为什么有些宗教形式与科学相冲

突,而有些则不然。在这些讨论中,形成了关于科学的大体一致的看法。在高等教育内部,支持大学改革的人们开始把科学视为一种非常成功的探究形式,因为它拒绝常识信仰。他们认为,由于科学家们愿意检验那些当前已经被接受的观点,在必要时修正或抛弃它们,所以科学是不断进步的。科学之高明依赖于它的开放性:科学家们必须能够自由地对已有知识进行怀疑。改革的提倡者们把科学与“客观性”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没有把“客观的”界定为“价值中立”。相反,他们用“客观的”来表示“通过经验地应用来检验”。

教育改革者们认为,大学能够通过促进科学的宗教研究和现代宗教实践,提供给他们学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宗教教育。科学的宗教研究的提倡者预言,科学的宗教研究将有助于使宗教融入到现代知识生活之中。然而,到20世纪早期,这种努力显然失败了。科学的宗教研究并没有将宗教融入现代知识生活之中,而是得出了宗教的“真理”在本质上不同于科学的事实真理的结论。宗教之价值是情感的和道德的,而不是知识的。此外,学生们对于这种新的宗教科学或现代宗教实践并无多大兴趣,在许多主要的大学中这些计划都衰落了。与其提倡者的期望正相反,科学的宗教研究只不过确证了宗教在知识中的边缘化。

建立和保持一种“科学的”现代宗教教育的失败,对新型大学来说是一个打击,但这并没有完全摧毁它们对于道德教育的信奉。在20世纪早期,大学教育者们逐渐放弃了没有宗教就没有道德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道德发展的世俗根源。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科学本身似乎成了道德指导的重要源泉。大学改革者们认为,科学探究鼓励良好的个人习惯,这些习惯与基督教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习惯是一致的。他们用乌托邦式的措辞来设想科学知识的进步。科学家们充满自信地希望建立一种宽泛的统一理论,这种理论能解释从最基本的自然事件到高级的人类社会复杂的现象的所有事情。他们认为,科学研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证明了传统的道德价值如节欲和一夫一妻制,满足了人类种族延续的需要。他们还认为,科学有助于解决现代工业所导致的新的道德难题。科学探究的提倡者们相信善与真的统一,期望者能通过创造更好的知识,他们能成为更好的人。这样,接下来创立现代道德教育的努力自然寄希望于科学。

在19世纪初期的二十年间,大学教育者们试图通过发展“普通的”科学

课程来提高科学的影响力。大学日益要求或大力鼓励学生们修那些新的、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介绍性课程。这些课程反映了这样的信念,即通过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大学能够完美地履行其对社会和学生的职责。

大学科学家的道德使命常常被忽视,因为其 20 世纪的继承者否认其伦理兴趣。然而,一直到 20 世纪二十年代,道德中立的科学模式在美国也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那时,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于声称他们的学科是最好的现代道德教育形式感到不安。他们拒绝乌托邦式的科学观和统一全部知识的努力。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能形成有用的、“实际的”知识,具有具体的和职业的效用,但无道德价值。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赞成专业化,认为更严格的研究标准能创造出比他们的前辈依据更宽泛的科学探究概念所获得的知识更为可靠的知识。同时,他们也受到专业关注如对于学术独立和专业顾问位置的渴求的驱动。由于被视为道德教育的一个源泉,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引起了大学管理者的注意和干预。科学家们要求更大的自主权,认为他们通过提供技术的而非道德的指导的研究领域能够繁荣发展。

当学院的科学家们日益信奉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式,并努力将他们在大学中的角色定位于从事研究和提供专业教育时,一些人文学科和艺术方面的学者却渴望承担道德教育的任务。文学和人文方面的学者们开始批评大学未能提供足够的道德指导,他们把人文学科描述为传统价值观念的传递途径,把艺术描述为宗教真理的表达方式。他们坚持认为,人文学科和艺术而不是科学,能够提供已在 19 世纪晚期的大学改革中失去的统一性和道德指导。

人文学科和艺术方面的学者们认识到,他们具有取得道德教育之衣钵的专业优势。人文学科的许多教师觉得专业研究的模式并不完全适于他们的学科。而且,他们在为其研究取得支持方面具有困难,因为与科学工作者不同,他们不能声称其研究最终能转化为造福社会的实用知识。他们不得不以其对于学生的直接的道德影响,作为他们要求支持的基础。作为价值观念的维护者,人文学者选择了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但却越来越成问题的职能。到 20 世纪三十年代,人文学科已经取代了社会科学,成为标准的新生预备课程。就像宗教被从“认知”真理中分离出来一样,道德被从“事实”知识中分离出

来,转而与“想象的”和“审美的”真理结合在一起。于是,善与美而不是与真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大学的管理者们欢迎把人文学科界定为道德教育的源泉之一的努力,但在20世纪初期的二十年间,他们也开始减少道德指导的课程形式。他们希望管理上的变革和课外活动能解决大学生们的品格培养问题,他们聘用专门的管理人员来处理“学生的生活”,设立学生辅导计划,聘用专门的教师来负责本科生教育,并开展新的活动,如“新生定向”活动。在那几十年中最重要的“道德改革”是宿舍的建立,大学的管理者们鼓励把建造宿舍作为一种为学生创造一个道德集体的途径。宿舍的建立,和其他课外的和管理的道德指导形式的发展,减少了对于教师应当提供道德指导的期待,造成了道德与知识在制度上的分离。

道德与知识在制度上的分离,反映了课程的发展。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教育家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来保持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统一,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20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哲学的发展,给了高等教育中的变革以知识上的认可。逻辑实证主义在知识陈述和价值判断之间作了明确的划分。同时,哲学家们开始接受把道德与非认知的情感和审美结合在一起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理论。

本书根据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所做的洞察,试图重构制度与思想之间历史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它回应了知识历史学家们对于事件或活动之背景不断增长的兴趣。历史学家如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和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已经证明,知识分子们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中和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他们精辟地证明,对于这些背景的理解有助于弄清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意义。为了消除主题与背景之间的区别,我把这种观念加以深化。既不是制度史也不是知识分子史仅仅充当另一者的背景:他们两者同样都是本研究的主题。我不认为要么是制度的需要,要么是知识分子的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本书中所列举的各种变化。这两者经常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